

Trust and Contract
for Governance

信任、契约 及其规制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及结构重组研究

张 缨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信任、契约及其规制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
关系及结构重组研究

张 纛 著

经济 管 理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任、契约及其规制：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及结构重组研究 / 张缨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ISBN 7-80207-009-0

I. 信... II. 张... III. 企业—信用—研究—中国 IV. F8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227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 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策划编辑：谭 伟

技术编辑：杨 玲

责任编辑：刘 静

责任校对：剑 兰

787mm×960mm/16

18 印张

247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9.00 元

书号 ISBN 7-80207-009-0/F·1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电话：(010) 68022974

邮编：100836

序

我的博士生张缨已经毕业两年了，经过补充和修订，她的博士论文《信任、契约及其规制——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及结构重组研究》即将出版，她邀我为该书作序。其实每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就其专门领域来说，都应当是超出了导师的研究范围和深度的，所以所谓作序，只能是从论文指导老师角度谈谈对该主题研究的想法。

“信任关系”既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对“非正式制度”的关注和研究，似乎是社会学的一个经典主题，这个主题由于新制度主义理论研究视角的兴起，而再次成为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如果说社会学与经济学和法学有什么研究上的区别，我想这种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是现实领域的区别，而是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观察角度和方法的不同。比如，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更多的是正式制度的话，那么社会学和人类学更多研究的则是非正式制度。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非正式制度广泛起作用的社会，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靠非正式制度来调节。在近 20 多年的社会大转变时期，快速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也造成新旧制度更替的“制度空白”，使非正式制度更加活跃。

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正式制度已经有很多深入的研究，但对非正式制度运行的“潜规则”，研究还比较缺乏。我近年来指导的博士论文，虽然涉及不同的研究对象、利用不同的调查资料，但基本上都是从各个侧面解释和揭示“非正式制度”的“潜规则”这样一个主题。如张继焦的《市场化

中的非正式制度》、张翼的《国有企业的家族化》、于剑波的《企业行动者的社会资本与社会成本》、赵延东的《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梁栋的《网络组织的兴起》、蓝宇蕴的《都市里的村庄》等。

张缨的这本著作，实际上是从“信任关系”的角度来阐述“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组织和经济运行的重要性。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是针对个体资本而言的社会资本，而是针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社会关系资本。

快速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信用危机，并不仅仅是传统的人情信用的危机，它也是普遍的信用道德和信用制度的危机。从假冒伪劣产品到上市公司会计报表造假，从“豆腐渣”工程到假文凭、假学历，从统计数据的浮夸虚报到学术界的论文抄袭，这一切都在昭示着是社会信用的普遍危机。

过去对传统信用体系的危机，多半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认为从“人情信用”到“契约信用”，从“互识社会”的熟人信用到“匿名社会”的陌生人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这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信用体系的危机，就是传统人际关系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

古典学者韦伯（M.Weber）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信任关系有两种方式：一是特殊主义信任，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另一种是普遍主义信任，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亲缘的私人关系基础上，所以中国人对圈内人有“特殊的信任”，对“外人”却非常不信任，而新教的伟大之处，是冲破了氏族的纽带，使商务信赖的伦理品质建立在职业经验的考验上，这一点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现代学者福山（F.Fukuyama）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经济的繁荣》一书中也认为，经济深植于社会生活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通常是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的本质和信任关系的基础是家族主义，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的信任度差异很大。美国、日本、德国属于高信任度国家，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属于低信任度国家，而只有那些拥有高信任度的社会，才有可能创

造较稳定、规模较大的企业组织，从而在新的全球化经济中具备竞争力。

卢曼(N.Luhmann)的研究走出了这种社会类型的分割。他在《信任与权力》一书中指出，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都存在着两种信任体系，即人际信任体系和制度信任体系，前者建立在“熟悉性”(familiarity)人情上，后者建立在法律等惩戒性或预防性机制上，二者都是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对风险的心理预期和估价，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而信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简化”社会交往复杂性的功能，但社会需要的不止是一种“简化”功能。卢曼甚至认为，“不信任”和“信任”是相辅相成的，同样具有“简化”功能，只有在一个“不信任”被制度化了的系统里，也就是说具有完备的监督机制的系统里，“信任”机制才能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

现在，研究信任的多数学者都是从信任的正面功能入手，把信任视为一种可以获得资源的、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并试图揭示和测算出这种社会资本的运行规则。不过，与卢曼一样，新制度主义的威廉姆森(O.E.Williamson)和理性选择学派的科尔曼(J.S. Coleman)，也都看到信任的另一面，他们在把信任视为降低交易和监督惩罚成本的机制的同时，也都指出信任实质上是建立在成本—收益上的一种“风险行动”。

继卢曼之后，还有一位社会学的信任问题专家也对维持信任体系的基础，提出类似的看法，他就是巴伯(B.Barber)。巴伯在《信任的逻辑和局限》一书中，把人们的信任分成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层次就是对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信任，其次是信任专业和权威人士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最后是信任社会交往的对方能够履行其义务和责任。在巴伯看来，信任体系的危机通常是发生在后两个层次，它来自权力、知识的滥用带来的监督机制失效。

所以说，人情信用和契约信用二者并不具有完全替代的意义，它们从不同的层次，调节着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交往。尽管二者的具体运行规则不同，但深层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卢曼提出的“不信任”的功能问题,可能是过去的“信任”研究有所忽略的方面。对于探索信用体系危机的原因来说,关于“不信任”功能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角度。

道德教育是要劝善的。人们只要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就能产生信任关系。但法律法规的制定,则必须建立在“好人也会变坏”的不信任基础上,在每一个不信任的环节,都建立监督和惩戒的机制。民众只要具有普遍的“不信任”的权力,也就是对信用的监督权力,就能够把这种不信任的机制,扩展到所有的担保社会信任体系的权威人士和组织。因为谁也不可能完全排除,权威人士上演“狼来了”的故事。而一旦人们普遍感到,他们的“不信任”根本就无法控制“失信”的蔓延,那才是真正的信用体系的危机。

“托拉斯”(trust)这种行业垄断组织,在英文里和“信任”、“信托”(trust)是一个词,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权威的组织,来自人们信任的委托。但权威组织也要有对其“不信任”(distrust)的监督机制,这就是反垄断的(antitrust)规制。只有民众感到,他们的“不信任”,在权威人士和权力组织的层次上也能控制“失信”,日常生活中的信用危机,才能真正化解。

中国的发展不能建立在传统和现代的断裂上,要利用传统和现代的各种资源,在个体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政府规制、法律契约等各个层面,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信任系统,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根基。

张缨的这本著作,尽管在理论逻辑的梳理和经验调查的概括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毕竟从一个很好的角度开拓出一块研究的天地。这方面探索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自然无须赘言,读过此书的人相信都会真切感受到。

李培林

2004年8月于北京

前言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信任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伦理特征，契约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制度性特征，它们共同构建了市场经济作为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的基石。信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颇为关注的热点。全球化、信息化给我国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尽管转轨转型期的经济生活现实已经提出迫切的需要，学界目前仍然缺乏对我国转型期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比较系统的探讨。

本书在“嵌入性”(Embeddedness)视角下，从行为表现层面探讨我国现阶段企业间信任关系，选择从企业行动者间的微观个体信任关系入手，通过相关理论和研究，比较微观现实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信任运行逻辑及契约实施，对企业交易行为深入剖析，构建了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转型期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核心特征及信任关系的重构，提出和验证了三个理论构想。

本书构建的理论框架包括以下内容：

1. 企业行动与区域经济生活相互嵌入 (Each - Embeddedness)，企业间信任关系连接微观企业经营和区域经济生活，直接影响上述相互嵌入和构建。

2. 对于信任以及信任关系、企业间信任关系的研究，包括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见解，也各有不足。结合生活事实，选择某一研究方向进行跨学科的探索和思考，能够形成具有

较强解释力的某种分析框架。

3. 从“嵌入性”视角切入, 分析企业行为, 研究我国转型期企业间信任关系是一种有效的研究策略。具体研究从微观个体行动入手, 关注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对这类信任关系的影响和作用。

4. 从发生学角度发现企业间信任关系不同模式, 它们的不同来源和运行逻辑、不同模式构建的共性特征、不同构建方式和维持。分析企业间信任关系的不同保障机制及运行中遇到的结构性障碍等。

5. 重视考察契约(制度设计)对信任关系的影响和作用, 这是人类为获得彼此信任进行的一种主动设计和规制。将信任关系看做人类为克服交易交换风险性而自发形成的一种机制, 契约是人类为克服交易交换风险性而有意识进行的制度设计。信任机制和契约机制是市场经济中互为表里的安排, 从此角度观察、理解我国经济生活, 能够发现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社会重构。

6. 考虑到我国的企业行动者有更强的社会理性人成分, 本书选择从行为表现层面认识和理解企业间信任关系, 这有助于进行之后的规制设计。

本书提出并发展的三个理论假设是:

1. 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实质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核心的信任关系。它不同于港台及海外华人企业的信任关系, 它是人情连带和理性计算的组合。不同于典型市场经济国家, 是契约背景下的信任关系, 而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缘约下的信任关系。

2. 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是一种多元构建, 主要有四种信任关系模式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即特殊主义工具性信任关系(C), 关系性市场型信任关系(C+D), 共存庇护主义信任关系(C+B)以及特殊主义协力式信任关系(C+A)。这四种模式运行逻辑并不一致, 常常会带来企业行动者想要的信任关系难以真正构建起来。这可能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中低信任度、违约现象难以遏制的一个深层因素。

3. 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是由显性和隐性第三方来保障的信任关系。每一种保障机制既有它的作用也有它的缺陷。真正有效的第三方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书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保障系统。

在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重构我国信任关系体系存在三大挑战与生机，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目 录

导 论

第一节	企业间信任关系与我国经济生活的重构	1
第二节	本书的主要特色	8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资料搜集	16
第四节	几个核心概念的辨析	21

上篇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 研究的一种分析框架

第一章 中西方对信任及信任关系的理解及其差异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信任与信任关系的研究	29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和中国企业信任问题的研究	41
第三节	中国传统信任观念和信任行为自有一套运行逻辑	48

第二章 中西方对契约的认识以及运用

第一节	契约源起及其运用	53
第二节	中国传统契约观念和契约实施	62

第三章 当代社会生活中信任体系与契约实施的新挑战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代的信任体系和契约观念	66
第二节 转型期的挑战与生机	70

第四章 企业行动与关系网络

第一节 企业行动和法人行动理论	77
第二节 社会资本、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	81
第三节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88

第五章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研究的一种分析框架

第一节 企业行动者与资源获得	93
第二节 关系网络中的信任与契约	100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中的信任关系与契约	109
第四节 企业间信任关系及其产生和维持	119
第五节 本书的分析视角	130

下篇 现阶段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核心 特征及信任关系重构

第六章 现阶段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主要模式及运行逻辑

第一节 现阶段我国企业间关系网络格局	139
第二节 转型期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主要模式及运行逻辑	146

第七章 转型期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工具性关系实质

第一节 假设的提出·····	155
第二节 案例及案例分析：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工具性关系·····	156
第三节 小结与讨论·····	174

第八章 转型期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多元构建

第一节 假设的提出·····	176
第二节 案例及分析：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多元构建·····	177
第三节 小结及理论说明·····	202

第九章 转型期企业间信任关系的保障机制

第一节 假设的提出·····	208
第二节 案例及分析：企业间信任关系的第三方保障及问题·····	209
第三节 发现与讨论·····	225

第十章 台资 M 企业网络的启示

第一节 特殊主义协力关系运作及信任构建·····	228
第二节 保障企业间信任关系的一些策略设计·····	248
第三节 台湾地区企业协力网络的启示·····	252

结语 建立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多元模式·····	254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71

导 论

第一节 企业间信任关系与我国经济生活的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后期至今,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信任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这一时期,是全球化、信息化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进入关键阶段的时期。

在经济生活中,为顺应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更为激烈、深刻的市场竞争,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模式以及发展战略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单个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基于网络的、供应链的整体和多维的竞争。供应链企业以及业务外包、战略网络、虚拟企业等多种模式网络企业应运而生。

企业网络式运作^①对建立企业间信任关系提出更为迫切的需求。网

^① 它既指企业组织形态的网络(network)化,也指 Internet 技术运用把这类企业网络带入到的新的虚拟企业(Virtual Business)的层次。

络企业间的相互合作需要彼此之间拥有较高的信任关系^①，相互信任是网络企业的关键性组织原则^②。然而，我国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着“低信任度”、“违约”现象，影响了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有效达成和作用的发挥，已经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经营甚至国家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对策性探讨接踵而至^③，政府加大信用建设的力度，但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1. 与信用不足和违约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环节和方面。例如，三角债问题，据统计，1989年底，全国企业间相互拖欠的三角债总额约为1240亿元，1991年为2000亿元，1994年上升为7000亿元，1998年约为11000亿元，而且拖欠势头正在向拖欠银行贷款利息、国家税收方向发展，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瘟疫。据专业机构统计分析，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而且逐年上升。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违约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违约纠纷以及其他经济纠纷案件为289万件，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

2. 信用销售迟迟不能在企业经济交易中广泛实现。大量企业不相信对方能够讲信誉、按时回款。在“欠债的是爷爷，要债的是孙子”的交易

① Powell, W.W., 1990, Ne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12, p195-356.

② Morgan, R., & Hunt, S. D., 1994, The Commitment-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58, p20-38.

③ 这些探讨散见于报刊、网站等媒体，归纳起来主要关注点有：(1) 信任信用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是它的理论核心，但缺乏对这一命题详细而有说服力的阐述）；(2) 从观念（主要指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方面）和制度建设方面分析造成“低信任度”和“违约”频繁的原因（站在这些企业的对立面，难以“理解”和抓住企业作出这种行为选择的多种动因）；(3) 如何解决信任信用“危机”和有约不遵有约难遵的建议（包括在观念上校正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法律制度建设、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但更多是流于呼吁和口号）等等，仁者见仁颇有启发，但效果并不明显。

环境中，他们不得不选择非现金交易不做。在近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商品交易会上，企业宁愿放弃订单和客户，不肯采取客户提出的任何信用结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方式退化，而欧美国家中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 80% 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越来越少。

3. 2002 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指出，在购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上持不放心态度的企业占 77.9%；有 62% 的企业担心受骗；63.6% 的人认为企业存在欺骗、造假问题。

4. 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冲垮了企业千辛万苦打造出来的“品牌”。众多消费者在真假难辨的产品面前，宁可放弃信任，甚至干脆购买价格低廉的假冒产品，避免“被宰”风险，影响品牌企业的经济利益，挫伤企业塑造品牌、打造企业信誉度的积极性。

5. 2004 年 3 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西安宝马假彩票案”。此次即开型彩票售出 1700 万元，总共摸出四辆宝马车，但其中三辆均落入承包商杨永明的口袋。惟一个真正摸中大奖的刘亮，反被造假者诬告为用假票领奖。尽管在 4 月底，所谓“发行主管”、实际的个体承包商杨永明和两名相关人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但政府信誉在这一事件中受到极大打击。作为博彩形式的一种，彩票业得以存在的所有理由，都系于信誉。自中国恢复彩票业以来，一直由政府设立专门部门进行垄断专营，并同时大力打击由私人发行的各种“私彩”。西安彩票事件充分暴露出在彩票发行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政府信誉被廉价出卖和滥用的现象，如果不够重视和处置不当，政府信誉受损以及可能引发的危机将难以想像。

全社会的诚信道德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逐步拉开帷幕：

1. 1999 年 7 月，刘永好等 33 位民营企业家在人民大会堂联名推出“信誉宣言”，号召从自身做起，讲信守约，呼吁建立规范的信用体系和法律秩序，引发众多民营企业积极响应。2000 年 2 月，武汉民营企业发表“信誉宣言”，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在经营活动中守信用、讲信誉、

重信义,共同推动社会进步;3月,山西省22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齐聚省城太原,发出响应“信誉宣言”倡议书。

2. 2000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在全国300个城市建立了针对单位的银行信贷咨询系统。2000年7月1日,上海市率先开通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为消解困扰金融、消费领域多年的“信用危机”提供资料数据的保障。就在“系统”开通前后半年的时间里,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对受理的信用消费类案件展开调研,结论是:某些新类型案件的出现,是单纯依靠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无法杜绝的,消除信用危机,还需要更多的保障^①。

3. 新世纪初始,金融系统的信用制度建设出台了新方案,存款实名制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假、赖、骗现象;地方政府加强了对本地区信用建设的系统推进和监管,例如,信用温州行动初见成效;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始打造信用安全区。

经济往来中的信任关系主要发生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工商企业^②之间以及工商企业与银行之间。目前新的制度设计主要针对银企之间信用和信任关系。工商企业间信任关系主要依靠法律(例如,合同法、票据法、公司法)制约,但成效不彰,违约现象司空见惯,甚至金额不到10万元的违约事件通常不会告上法院,即使是小企业经营者都有这种共识,是他们成本—收益的粗略计算^③。

相对于银企信任关系而言,工商企业间的信任关系更为基本,它直接影响最基本的交易行为,涉及的经济行动者更为广泛,它的复杂多变性更加不利于制度设计和实施。这类信任关系的低下,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基本信任关系的质疑,形成恶性循环,其破坏性难以估量。

在前面援引的案例中,采用了“信任(trust)”、“信誉(credit; prestige)”、“信用(trustworthiness; credit)”等不同词语,包含的涵义有不

① 详细资料参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0年11月10日09:48新闻晨报。

② 含工业—工业,工业—商业,商业—商业三类。

③ 访谈过的多家企业选择的标准。